

丝绸之路上的丝绸技术西传之推论



<https://doi.org/10.5281/zenodo.7336775>

——以阿弗拉西阿卜博物馆大使厅壁画为例

作者简介：董豪（1988—），

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兰州，730000。

（电话：18293963332，邮箱：303800731@qq.com）

摘要：撒马尔罕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其阿弗拉西阿卜遗址区保存着丰富的历史遗迹，尤其是阿弗拉西阿卜博物馆“大使厅”壁画具有高度写实性，反映了中国丝绸技术的传播。本文从壁画内容入手，结合丝绸西传的相关的传说和文献资料，以揭示出在中国丝绸技术西传并无明确的时间记载情况下，粟特人因为对丝绸技术的重视，使得丝绸西传史实得到如实记录。进而证实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博物馆的大使厅壁画上中国使团形象，是具有明确时间记载丝绸生产技术的转移的有力证据，深刻反映了中国同中亚地区在丝绸之路上友好交往的历史。

关键词：阿弗拉西阿卜；大使厅壁画；中国使团；丝绸技术西传

**THE EXPLORATION ON THE SPREAD TIME OF CHINESE SILK PRODUCTION
TECHNIQUES TO THE WEST**

Take the murals painted on the walls of Ambassador Hall at the Afrasiyab Museum as an
Example

DONG H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Samarkand is an important hub city on the Silk Road. Afrasiyab is the oldest part and the ruined site of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city of Samarkand. The murals painted on the walls of Ambassador Hall at the Afrasiyab Museum can reflect real history. Given that there are no powerful evidence that can prove the time that Chinese silk production techniques spread to the West, and the Sogdian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silk techniques, hence the aim of the article is to reveal that there are some historical facts that can tell us the exact time that Chinese silk production techniques spread to the West based on the relevant legends and documentations. What's more, the article will verify that the scenes depicted Chinese embassies in the Afrasiyab murals are strong evidence that recorded the exact time that production techniques of silk spread to other countries, which can represent the history of friendly exchanges on the Silk Road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Key words: The murals of the Ambassador Hall; Chinese embassies; the production techniques of Chinese silk

撒马尔罕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中部的泽拉夫尚河盆地，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撒马尔罕在乌兹别克语中意为肥沃的土地，元代耶律楚材说：“寻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名之。”¹自张骞“凿空”西域后，中亚同古代中国的交往日益密切，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交流频繁，在科技领域也有很多交流，中国造

¹（元）耶律楚材著；向达校注：《西游录》，《中外交通史丛刊4》，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页。

纸术、丝绸技术西传，中亚的很多天文学家也到过中国²。撒马尔罕也随着“丝绸之路”开通而繁荣，最新的学术研究显示“丝绸之路”甚至从来都没有衰败，在 17—18 世纪甚至变得越加繁忙³。

今天的撒马尔罕分为古城和新城，古城包括已经成为废墟的阿弗拉西阿卜（Afrasiab）遗址和中世纪建设的帖木儿古城，新城则为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快速扩张建设的现代城区。公元 1220 年，在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铁骑进攻下，这座城市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成为废墟。丘处机一行在觐见成吉思汗途中记录“方算端（即苏丹，回教国王）之未败也，城中常十余万户，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⁴。14 世纪下半叶，阿米尔·帖木儿建立了帖木儿帝国，建都撒马尔罕，这座城市得以再现辉煌。由于帖木儿时代到苏联时期都是以新的城市中心替代旧的城市中心，没有在前者的基础上改造和重建，原有的旧城被废弃了，这就使得阿弗拉西阿卜遗址区得以保存，因而遗留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今天的阿弗拉西阿卜遗址区有着跨越两千多年历史的遗存，从粟特本土的青铜时代到亚历山大东征的希腊城堡，再到前伊斯兰时代的清真寺，都在这个遗址中有所发现。而撒马尔罕在中国历代史籍中也多有记载，这些记载反映了丝路交流的频繁，而且在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大量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民俗等的资料，结合文献记载与出土资料，对于解读一些历史信息至关重要。而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博物馆的“大使厅”壁画，则是中国丝绸技术西传的重要实证之一。

一大使厅壁画的研究解读

1965 年春，阿弗拉西阿卜“大使厅”壁画被发现。但壁画所在房间的四面墙中，三面的墙顶被破坏了。前苏联考古学家 B.A. 希什金发现有些墙面绘有壁画，下面部分留存，壁画高 2 米多，宽 10.7 米。因为西墙绘有各国使臣的形象，所以壁画所在的大厅被称为“大使厅”。1990 年，在出土壁画的原址上建成了阿弗拉西阿卜（Afrasiab）博物馆。现在大使厅壁画的情况大致如下：

西墙，为正对着入口处，上半部分已经湮灭漫漶，幸存下来的只有下半部分，描绘的是一些突厥武士和各国使臣形象。左边是波斯使臣，中间位置是唐朝的使臣，右边是吐蕃使臣，突厥使臣，最右边是高丽使臣；

北墙，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形象，左边武则天在划龙舟，右边是唐高宗猎豹的场景；南墙是粟特王新年出行图，描绘的是国王新年祭祖场景。最左边的是神职人员，站着面向移动的人群，人群最前面坐在大象上的是拂呼曼的王后，后面是嫔妃，再后面是祭司。祭司后面比例更大的图像是粟特王拂呼曼；东墙，描绘的是印度的史诗场景。左边是托勒密教印度的学生学习天文，右边是印度神话 Krishna 的爱情故事。⁵

现存壁画西墙的各国使臣中，中间位置现在能看到的有唐朝的使臣一行有四人，原本五人，第五人在创作前作为底稿，壁画完成后涂抹掉了。这几位使臣手持礼物，头戴黑色幞头，带有佩剑，是典型的唐人装束（见图 1）。在西墙中间部分壁画复原图中能更清晰地看出唐朝使臣所持之物，四人中，最后一人手拿串状的蚕茧，前面一人手持生丝，最前面两位手持成品的丝织品（见图 2）。

²Аблат Хўжаева-Т.Буюкирак йўли- Муносабатларватақдирлар. Ташкент: Узбекистон милл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си» Давлат илминашириётъ, 2007, р.254.

³米华健：《丝绸之路研究与清帝国边疆》·《商业观察》·2013年第3期，第91页。

⁴李志常著，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⁵（法）葛乐耐著；毛铭译：《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第一版）·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年，第39页。



图1 西墙中间部分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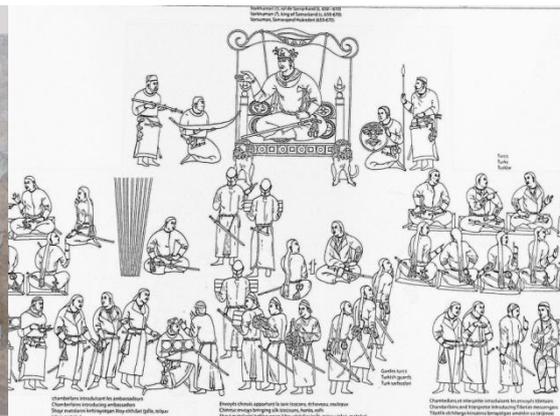


图2 西墙中间部分壁画复原图

韩森认为，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描绘了当时康国的政治形势图景，其主题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⁶。因而根据壁画内容，可以探究重要的历史信息。

从壁画创作风格来看，粟特人有在其壁画上绘制中国人形象是当时的传统。昭武九姓之一何国就有类似习俗，根据《新唐书》记载：

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林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⁷

城左是城东，楼上的壁画与阿弗拉西阿卜壁画是高度吻合的。壁画北边是中国人形象，东边是突厥人和印度人，西边是波斯人和拜占庭人，南边没有记载，而且壁画所在地“重楼”，君主一早要到这里来参拜，然后再离开，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场所。

粟特人通过经商等方式来到中国后，把这种绘画风格也带到了中国。莫高窟第158窟营建于吐蕃统治时期，其中《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包括唐帝国的汉族国王、吐蕃赞普并其他各国王子的形象，这种由包括中原汉族帝王在内的各国王子共处一个空间的绘画方式，是粟特艺术中常见的内容，广泛见于粟特地区的绘画中，功德主这种做法一部分原因还是保留了粟特人的艺术传统⁸。所不同的是，阿弗拉西阿卜博物馆壁画中，无论是各国使臣，还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形象都是高度写实的，不再是中华古帝王。因此说学者们通过各国使臣形象，武则天在龙舟上的形象与粟特国王出行图等信息，可以比较明确地推断出壁画的创作时间及月份。

根据法国学者葛乐耐的考证，壁画当作于7世纪，应在公元660年或者公元663年，是大使厅创作的最佳年份⁹。据《新唐书》记载：“康者，一曰萨末鞅，亦曰飒秣建。”¹⁰飒秣建即使撒马尔罕音译而来。“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纒为都督。”¹¹从当时政治形势来看，此时正值康国国王拂呼曼臣服于唐朝时期，粟特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上都与唐朝保持着密切联系，当时撒尔马罕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唐朝使臣手拿蚕茧和生丝，出现在西墙南面的中轴线上，暗示了唐朝作为天朝上国的核心地位¹²。

⁶ (美) 芮乐伟·韩森；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162-163页。

⁷ 《新唐书》卷14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7页。

⁸ 沙武田：《敦煌莫高窟第158窟与粟特人关系试考（上）》·《艺术设计研究》·2010年第1期，第18页。

⁹ (法) 葛乐耐著；毛铭译：《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第一版）·第36页。

¹⁰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六《西域传》·第6243页。

¹¹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六《西域传》·第6244页。

¹² (法) 葛乐耐著；毛铭译：《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第一版）·第31页。

韩森认为壁画创作于公元 660 年至公元 661 年，她对壁画内容有如下描述：“五个穿戴着典型中式袍服和黑帽的中国人手捧丝绸丝线和蚕茧站在画面中间。中国人被描绘成与其他使节一样毕恭毕敬地来献礼的样子，然而实际上康国国王仰赖于中国的军事支援。中国人比其他使节重要，因此他们占据画面的中心。”¹³韩森之所以说五人，是包含了在底稿上的使臣形象。

而赵丰则对壁画上波斯使臣身上的锦袍图案进行了解读，锦袍上的图案有衔着绶带的含绶鸟；有长着狗头和翅膀、后面还有孔雀大尾巴的赛姆鲁怪兽，还有双人骑骆驼或者大象的图像，马鞍上也有大量的联珠纹¹⁴。进而证明这些图案是波斯锦的风格，而类似的图案在中国境内也有所发现。

以上对壁画上所反映的历史背景进行的深入探究，很好地揭示了壁画所体现的政治形势及中外交流情况，说明了壁画的高度写实性，但对于唐朝使臣携带丝绸技术这一点则缺少论述。丝绸的生产要经过种桑养蚕，产出蚕茧，再由蚕茧缫丝，进而织成丝织品这样完整的生产过程的。赵丰认为，丝绸之路上丝绸技术的传播和纺织文化的交流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果。如丝绸技术的向西传播就应该分为丝绸产品的传播、蚕桑生产技术及蚕种的传播、丝织技术的交流和提高等几个步骤¹⁵。因此唐朝使臣携带携带的礼品，从蚕种、生丝到丝织产品的形象，完整的反映了丝绸的生产全过程，表明丝绸技术的在撒马尔罕地区的传播，甚至是这几个步骤同时进行的。说明粟特人创作在壁画时描绘这一历史事件，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刻意将中国丝绸技术也于这一时期传入中亚这一历史事实如实记录下来。因此可以断定，在公元 660 年左右，唐朝为了对拂呼缦的臣服表示友好，而将丝绸技术也一并作为礼物送到了康国，是一种极高规格的礼遇。

二 丝绸技术西传传说与大使厅壁画的意义

自张骞“凿空”西域以后，丝绸及丝绸技术就逐步西传。近年来对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很多，对丝绸的西传也有很多论述，但即使通过出土的丝织品，能够通过科技手段分析出丝绸的制造方法及产地，但真正能够明确证实丝绸技术传播的时间节点的实证却很少。即使在今天，丝绸技术到底何时从中国传出仍然难以确定，现有的说法多来自于传说。例如，丝绸传入伊朗就是根据民间传说，萨珊波斯帝国的两位使者在学会了养蚕缫丝技术后，将蚕种安放在竹筒中小心翼翼地带回伊朗，从此开始了波斯和西亚的丝织业，而东罗马帝国的蚕种则是来源于印度僧侣从中亚带来，而养蚕和丝织技术则可能通过于阗，只是难以确定具体时间¹⁶。而丝绸技术传往西域，也是依据《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

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饲之。自时厥后，桑树连阴。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

¹³ (美) 芮乐伟·韩森；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第162-163页。

¹⁴ 赵丰：《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黄山：黄山书社，2016年，第152页。

¹⁵ 赵丰：《中国纺织考古与科学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211页。

¹⁶ 张国刚：《丝绸技术的西传》，《南风窗》，2017年第22期，第102页。

茧。敢有犯违，明神不佑。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¹⁷

这是玄奘西行路过于阆时的一段记载，凡提到早期丝绸技术的西传，这段记载都为重要参考资料。《新唐书》中对于阆国养蚕缫丝业传入的描述，与玄奘所记完全吻合，其史料应来源于此，但在相关史籍中并无明确记载这一段和亲故事。根据考证，约在“十六国”至北朝时期，中原的养蚕缫丝业传入了于阆¹⁸。通过分析这一记载仍能推断出一些历史事实，一是古代中原王朝一直对丝绸生产技术进行着管控；二是即使养蚕缫丝技术传出中国，中国的丝绸领域质量仍然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古代涌现了大量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科技成果，但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私权观念的缺乏，加之传统政治、经济与文化观念的影响，导致了中国专利制度的缺位¹⁹，因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因此的相关科学技术的转移就很少见于相关典籍。虽然中国古代缺乏知识产权思想，但也不能以今天的认识要求古人，事实上古人也是由技术保护观念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虽然有拓展丝绸之路的愿望，但也严格控制养蚕缫丝技术的流出²⁰。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与突厥的关系就是一个例证。当时突厥默啜可汗愿意将女儿出嫁唐朝，要求唐朝给予谷种、农具和铁等为条件，建立和亲关系，但随后发生战争。默啜的理由是：

与我蒸谷种，种之不生，一也。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二也。我与使者绯紫皆夺之，三也。缯帛皆疏恶，四也。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昏，五也。我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²¹

这显然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找借口，但唐朝给突厥的谷种为蒸过的，使得种植后不能生长，同时所给的金属制品质量不好，反映出唐朝对于农业技术、丝织技术和冶炼技术都有一定的保护意识。而据《册府元龟》记载：

开成元年六月，淄青节度使奏，新罗渤海将到熟铜，请不禁断。是月京兆府奏：“准建中元年十月六日敕，诸锦罽、绫罗、縠绣、织成、细紬、丝布、牦牛尾、珍珠、银、铜、铁、奴婢等，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又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又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²²

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六月，朝廷禁止官民与“新罗”“渤海”开互市，甚至禁止中国人与外国人通婚和私自贸易，这些措施目的是为了保证官方贸易，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限制先进技术外流的作用，只有当中央政府在表达对外友好时才能进行互市贸易。

因而于阆人才特别珍视这些历经艰难得到的蚕种，要等到“蚕蛾飞尽，乃得治茧”，这样蚕丝质量就难以保证。中国人在结茧后马上缫丝，或设法杀死蚕蛹，不让蚕蛹破坏蚕茧，以保证缫丝时丝不会断。而根据瞿萨旦那的相关记载，当地人特别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蚕种，为了让所有蚕蛾都破茧、交配、产卵和培育新蚕，他们不允许杀死蚕蛾。因此他们只能等蚕蛾破茧后，再抽丝纺线，这与中国缫丝的做法完全不同。也有一种说法指出，由于佛教不主张杀生，所以限制了他们缫丝的做法，只能纺线²³。而同样处在西域的焉耆国“国小民

¹⁷玄奘，辩机著；范祥雍汇校：《大唐西域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19页。

¹⁸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60页。

¹⁹杨利华：《中国知识产权思想史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页。

²⁰杨利华：《中国知识产权思想史研究》，第13页。

²¹《资治通鉴》卷第260，唐则天后圣历元年八月戊子，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647页。

²²《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互市》，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727-11728页。

²³赵丰：《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第129页。

贫”“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²⁴。绵纩指的是蚕丝制成的绵絮、被用材料，是不能用来织造丝绸的。所以无法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丝织品，至于焉耆国是否也与于阗国问题一样，无法证明，但也当是技术限制所致。《醒世恒言》中记载养蚕技术道：

那育蚕有十体、二光、八宜等法，三息五广之忌。第一要择蚕种。蚕种好，做成茧小而明厚坚细，可以缫丝。如蚕种不好，但堪为绵纩，不能缫丝，其利便差数倍。第二要时运。有造化的，就蚕种不好，依般做成丝茧；若造化低的，好蚕种，也要变做绵茧。北蚕三眠，南蚕俱是四眠。眠起饲叶，各要及时。又蚕性畏寒怕热，惟温和为得候。昼夜之间，分为四时。朝暮类春秋，正昼如夏，深夜如冬，故调护最难。²⁵

可见，养蚕也是技术含量高的工作，还受种种限制。焉耆国小民贫，但蚕茧“唯充绵纩”，恐怕是不得已而为之。丝绸生产有从采桑、养蚕、煮茧、抽丝、织造到印染这样完整的程序，没有优质的蚕种，良好的养蚕技能及丝绸织造技术，不可能织造出更高价值的丝绸产品。所以即使在此之前，丝绸技术已经西传，但是中国无论是蚕种培育还是在生产的丝绸上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众所周知，丝绸是丝绸之路上重要产品之一，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唐代大量丝织品在丝绸之路上的流通，主要乃是当货币进行的，他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商品，不如说是货币。丝绸除了部分高档、特殊产品外，大量的绢练乃是作为货币流通而输向各地的。²⁶基于此，中原王朝对于丝绸技术进行了保护，因而丝绸技术整体或部分的转移，往往通过一些非正常渠道，因而史籍中缺少明确的记载。

再回到壁画本身来看，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的现实主义描绘手法，比之于丝绸技术西传的传说，乃至于是于阗国“蚕丝公主”的记载，更确切地说明了丝绸技术传入撒马尔罕的时间，而且是蚕桑生产、蚕种引进和丝织技术的完整转移，唯一缺陷是没有“蚕丝公主”的故事那样生动。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中间商，擅长经商，在中国史籍中以好利的形象出现，据《新唐书》记载：

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珞若黏云。习旁行书。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²⁷

擅长经商的粟特人非常清楚，获得丝绸技术，其利润是非常可观的。唐朝使臣居于壁画的中心位置，一方面体现了唐朝的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粟特人对丝绸技术重视。如果说仅为了体现唐朝的大国地位，那么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上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形象则足以说明问题。西墙对中国使团携带蚕种，生丝到丝织产品的形象细致入微的描绘，无疑说明了当时中国使团携带的不仅限于丝绸产品，而是把优质蚕种及丝绸技术也带到了康国，丝绸技术的传播显然使粟特人深受感动，而将这一事件记录于壁画中心。因而在壁画的中心位置记录丝绸技术转移的事实，清晰描绘这一场景，且如此详细，如实反映了中国丝绸织造技术西传中亚这一历史事件。

赵丰认为，唐代前后，中国丝绸生产技术已经传到了中亚²⁸。而根据壁画可以进一步确定，在公元660年前后，中国的完整丝绸技术已经传入中亚地区。因此，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博物馆“大使厅”壁画上中国使团的形象，是丝绸技术西传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最直接的证据之一。而中国古代通过设立都护府或者和亲方式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使得大量的生产

²⁴《周书》卷50《异域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16页。

²⁵冯梦龙编；顾学颉校注：《醒世恒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²⁶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208页。

²⁷《新唐书》卷146《西域传》·第6243-6244页。

²⁸赵丰：《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第170页。

技术和工业产品也随着互市及和亲方式进入其他地区，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传播。而且中国的数学知识、建筑技术、音乐知识和植桑养蚕织帛技术由此西传，正是双方友好交流的见证²⁹。

三 丝绸在当地的发展和传承

丝绸技术传入中亚后，在当地得到了良好地发展和传承。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证实。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中国中原地区的丝绸开始由新疆输往中亚各地。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丝织技术并未广泛传播。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蒙恰特佩）在粟特时期或更早（公元3—4世纪），费尔干纳先民就曾借鉴中国丝绸生产技术，使用当地产丝来制作丝绸产品，成为受中国直接影响的中亚盛产丝绸的中心之一³⁰。但即使一些地区掌握了丝绸生产技术，成为了生产中心之一，在丝绸种类和质量上还是远不如中国中原地区的。在唐朝中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丝绸品种就有锦、縠、绫、罗、纱、织成、缣丝和绒这七大类³¹，但同时期中亚地区丝织品的种类是比较少的，杜佑《通典》对此有所记载：

康国都於萨宝水上阿禄迪城，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幪以帛巾。丈夫翦发，锦袍。名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善於商贾，诸夷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丧制与突厥同。俗奉佛，为胡书。气候温，宜五穀，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骡、驴、犂牛、黄金、硃砂、甘松香、阿萨那香、瑟瑟、麀皮、氍毹、锦、叠。多蒲萄酒，富家或置千石，连年不败。³²

《通典》记载了唐天宝末以前的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史，成书于唐贞元十七年（801）。当时康国可能已经过国王拂呼纒时代，掌握了丝绸生产技术，但出产的丝绸产品只有锦和叠两种，因此唐朝在丝绸生产领域无论产量和质量都保持着领先地位。

而丝绸技术西传以后，当地生产的丝绸也对中原地区丝绸生产有积极影响。中亚一带起初用自己的技术织成平纹纬锦，后来进行了技术提升，织出了斜纹纬锦。他们的斜纹纬锦比中国的更漂亮，以至唐朝开始仿制粟特锦，使中国在学习中亚技术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技术革新³³。这些技术革新，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丝绸生产类型。但康国的粟特贵族对丝绸产品的喜爱，仅依靠当地生产是不能满足其要求的。粟特商人把中亚的玻璃器、宝石、各种装饰品运到中国，再把中国的丝绸、香料、漆器、铁器和金银器等运到中亚，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转手卖给波斯人、罗马人、印度人以及草原上的游牧民族³⁴。因而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上，粟特人在进行转手贸易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当地贵族阶层的物质需求。

丝绸技术在中亚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虽然这一传承也曾遭遇过挫折。蒙古西征时，对撒马尔罕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城市几乎成为废墟，在耶律楚才到达时，当地已经“有桑

²⁹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第560页。

³⁰（乌兹）马特巴巴伊夫·赵丰主编：《大宛遗锦：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蒙恰特佩出土的纺织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页。

³¹朱新予：《中国丝绸史》，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92年，第153-161页。

³²《通典》卷193《边防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255-5256页。

³³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第170页。

³⁴李瑞哲：《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特点浅析》，《藏学学刊》，2007年第1期，第174页。

不能蚕”³⁵。但到帖木儿王朝时期，各方面很快又得到了恢复，当时的撒马尔罕尤其以造纸闻名，织机纺织红布和银白布，以及织锦和生丝织品等，都是有名的物产³⁶。

时至今日，撒马尔罕仍是乌兹别克斯坦丝绸的主要产区之一，而乌兹别克斯坦在丝绸生产上也居于世界前列。据统计，乌兹别克斯坦现在共有 4.4 万公顷桑园和 3 亿株散栽桑树，蚕茧产量位居世界第三，人均蚕茧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15 年蚕茧产量 2.6 万吨，仅在中国和印度之后。所需蚕种除部分来自本国种场自行繁育外，部分仍来源于中国³⁷。而传统的丝织技术在当地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马尔吉兰的纪念品丝绸厂，工人们仍然沿用着古老的工艺，从煮蚕茧、剥蚕丝到扎染，全部是一千年前传承的方法³⁸。

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博物馆的大使厅壁画上中国使团传播丝绸生产技术的形象，是有明确时间节点的中国丝绸生产技术的西传的实证，深刻反映了中国同中亚地区在丝绸之路上友好交往的历史，是历史上中国同中亚在丝绸之路上政治、贸易和科技友好交流的产物。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和中亚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将更加频繁，新材料的发现将进一步揭示中国同中亚地区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友好交往，也将为当代提供更多借鉴。

³⁵ (元) 耶律楚材著，向达校注：《西游录》，第3页。

³⁶ [英] G·勒斯特兰奇著；韩中义译注：《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 675 页。

³⁷ 许刚：《乌兹别克斯坦蚕桑茧丝绸产业考察报告》，《江苏蚕业》，2016年第4期，第39-40页。

³⁸ 刘子超：《不安的山谷—费尔干纳纪行》，《南方人物周刊》，2017年第40期，第68页。